

羅家倫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(上)

王聿均

(本文插圖刊第3、4、39、132、133頁)

一、前言

羅家倫先生，字志希，浙江紹興人。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(西元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)冬至日，卒於民國五十八年(一九六九)十二月二十五日，享壽七十三歲。他的生平，除其手書目傳^①外，各家記載者甚多^②，勿須重述。他雖歷任要職，然中心旨趣「常集中於教育文化學術工作」^③。憑其深厚學養，遠見卓識，故能成其淵博和廣大。著作有「新人生觀」、「新民族觀」(上册)、「文化教育與青年」、「科學與玄學」、「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」、「黑雲暴雨到明霞」、「疾風」、「耕罷集」、「滇黔寄興」、「西北行吟」等；譯著有「思想自由史」、「近代獨幕名劇選」等。嗣後將「耕罷集」、「滇黔寄興集」、「蓼莪集」、「玉門出塞集」、「海色河聲集」、「轉綠迴黃集」、「天竺紀遊集」和「海天俯仰集」等八種詩集，手抄影印而成「心影遊蹤集」上下冊^④。「思想自由史」係英 John B. Bury 原著，於民國十五年譯於巴黎。「近代獨幕名劇選」，譯英

美暨愛爾蘭作家 John Masfield, George Middleton, Lady Gregory, John Galsworthy 等十人原著，民國二十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。早年譯有「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」(芮恩施 Paul S. Reinsch 著)，民國十一年亦由商務出版。此外晚年的著作尚有「簡體字運動」、「六十年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」，及主編的「國父年譜初稿」和二稿^⑤。其中「新人生觀」一書，即印至二十九版。至於中英文學術論文，散見於國內及各國學術刊物者甚多，並當選為英、法、德各國歷史等學會會員。民國四十七年(一九五八年)被選為「中華民國筆會」(The Chinese P. E. N. Centre of Taipei, R. O. C.) 會長。

羅先生對國家的貢獻甚多，對學問的興趣極為廣泛，由於具有超人一等的智慧才華，故對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教育、地理甚至科學，皆有精湛的創見；甚鮮作專門而深入的研究。同時，他獨具詩人的心靈，喜歡登臨覽勝，託詩篇以誌生活的片鱗鴻爪，在「心影遊蹤集」的自序中說：

「憶前二十五年國難突起，時艱高目，孤憤塞胸，間作短詩，藉抒抑鬱，精神上張弛之調協，

文學中之妙諦存焉。余常以絕句遣興者，以其拘束較小，不必作使事與對仗工夫，而音節復近自然，較易成誦。……藐躬生於憂患，不遑寧處，詎辭冒犯，迭味炎涼；然萬方多難，未廢登臨，索險尋幽，彌增興感。雄奇之雲峯雪嶺，浩渺之滄海流沙，舉凡雲端一羽之痕，沙上明駝之跡，前人所無緣兼收者，余幸得而並蓄。惟此情此景，亦常借憂患以俱來，此余紀遊之詩之所以獨多也。」

觀其內心的鳶飛魚躍，及其旅途的多彩多姿，又何能永遠沉潛於學術的研究？所以說，他在學問上是一位「邊緣的人」(Marginal man)，也是一位「但開風氣不為師」的人。他並非專家，實為一通才。此種情形，不僅見於學術方面，亦見於政治方面。他對政治甚有興趣，動機不外是愛國愛民的「孤憤」情懷。他曾說：「在政治方面，我是特立獨行的！」他只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，對於現實政治，並未作透徹的瞭解。所以他在言論上的貢獻，大於實際事功的貢獻。在他求學的歷程中，亦有極為類似之處。他先後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、哥倫比亞大學

研究院、倫敦、柏林、巴黎三大學研究院，前後七年，治歷史與哲學。並在大英博物館蒐集資料，可見他求知範圍的廣闊。他是「遊學」，而非「留學」。他不願固定於某一學校，專攻某一學科，他的目的不在獲得學位，而在求學問的融會貫通。他是學海中的旅遊者(Tourist)，但其長處亦即在此。他的學問不靠苦學得來，而是靠敏銳的洞察力和感受力，因而往往能有獨特的創見。下述他對史學、文學和教育方面的認知，率都來自此種靈感。

二、對於近代史研究的倡導

羅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倡導，蔣永敬先生著有「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」一文，論述甚詳，本文僅略加補充。

民國九年秋，羅先生赴美深造，先入紐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(Princeton University, New Jersey)研究歷史與哲學，翌年轉哥倫比亞大學，與杜威(John Dewey)、伍德瑞治(Woodbridge)、海斯(Carlton Hayes)諸教授相過從⑥，視野日拓。並與蔣廷黻相識，互相討論有關中國史學及研究方法問題⑦，後來二人都成爲倡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驅者。不過，他們此時所重視的，尚不出國際關係及外交史的範圍。民國十二年冬，羅先生由美赴德，入柏林大學歷史研究所。十四、五年間，遊歷英、法，入巴黎大學，並赴英國牛津大學，蒐集有關中國近代史資料。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、倫敦大學東方學院、巴黎國家圖書館、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，他都曾發現

不少珍貴資料，有助其後來完成「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」一書，此爲他的第一本專著。

羅先生旅歐期間，對太平天國的歷史，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對太平天國史料的蒐集，不遺餘力。據他說：

「前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之間，有幾位朋友，在國外圖書館中，發現了許多太平天國的書籍和文告，或抄或影，帶回國來。如劉半農、俞大維、許地山諸先生都是做過這類工作的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但是除半農因發現在最初而略有刊印外，其餘的人，都因爲有心做一點考訂的工作，附帶發表，而不會將這類抄影的文獻，刊行於世。其實這項抄影的工作，不過是爲太平天國保存文獻而已，並不足以稱研究太平天國」⑧。

以上所述，雖爲自謙，亦係實情。當時大家抄錄影印者，多屬大英博物館所藏之資料，似乎未曾注意到劍橋大學圖書館「威安瑪藏書」(Wade Collections)中有關太平天國的史料⑨。但羅先生和其友人們的努力，確實已鼓起了國人談太平天國及研究太平天國的風氣。

民國十五年春，羅先生於巴黎提出「收輯史料以爲研究初步」的計劃，包括購原本史料、原本史料的照像或鈔寫，速購有關中國史料之絕版西書與新出版之西書等項。他認爲若能按此計劃進行，每年有兩萬元可以分配，則十年後必大有可觀。因曾先後向清華及廈門大學進行經濟資助研究中國近代史者，羅先生實爲第一人。是年夏

，他自歐返國，任東南大學教授，時間雖短，但却開了「中國近代史」的課程，是爲我國大學有此課程之始。任中央政治學校兼代教育長時期，則授「中國近百年史」。以後任清華及中央大學校長時期，皆對中國近代史的課目，極爲重視，並列爲歷史系的必修科。復禮聘蔣廷黻至清華任教，介紹歐美學者對於中國近代史各種問題的新見解與新觀念。

民國十九年九月，羅先生接受武漢大學教授之聘，前往短期任教。即於此時撰成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」一文，刊於武大「社會科學季刊」第二卷第一號，所論皆深中肯綮。嗣又在南京加以增訂，遂成定稿⑩。此文富於啓發性，實爲半世紀以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獻，特別是在開一代風氣上，尤其不同凡響。他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，提出嶄新的觀念，介紹科學的研究方法，可說是經過縝密思考後所得的結論。他認爲近代中國與西洋的接觸，愈來愈密切，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影響。不只是軍事、經濟和所謂一切物質文明，因此發展了新的局勢；而且政治制度、社會制度和文物基礎，也因此受了劇烈的震動和變更。「要研究中國政治的改革和變動，非打通國際的情形來看不可；要研究社會的改變和生活，非綜合他國的現象來看不可；要研究文化的演進，非考察世界的學術思想不可」⑪。所以進一步主張，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必有任何顧慮，應該從速進行。比較起來，「文獻足徵」和「所見異詞」優於「所聞異詞」，是研究近代史所佔最重要的優勢。可是近代史的文獻雖多，喪失

的也快，史料如其將來稀少的時代，再來視若瑣璧，何如從速利用？「在目前的不研究，難道等將來湮沒之後，對荒邱而太息」^⑫嗎？這種呼籲，真是語重心長。綜觀全文，可見出羅先生所提的幾項具體建議。簡述如下：

一、強調史料的重要。以為歷史研究法，祇是史料研究法。其步驟為史料的尋訪、蒐集、整理、考訂、發表。

二、認為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，還不到時期。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，非先有「中國近代史料叢書」的編訂不可。這是基本的工作，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。

三、提出專題 (Monograph) 研究或分題研究的重要性。沒有一種史學要成為科學的史學，而不經過「專題」這個階段的。

四、口述歷史 (Oral History) 的倡導。他舉出章實齋修永清縣志，「親詢鄉婦委曲」，證明許多實際的情形，是要靠當代人口述的。希羅多德 (Herodotus) 的記載，是他從埃及等處親自見聞得來的。突西底德斯 (Thucydides) 是親自參與伯羅奔尼撒戰役 (Peloponnesian War) 的人，所寫的戰史也是親知的，是一部「很可靠而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著作」^⑬。羅先生對於口述歷史的重要，早有遠見。

五、建議設立「檔案保管局」。民國十七年，鑒於戰爭使若干檔案散失，建議設立這個機構，一如英國的「公檔局」(Public Record Office)。在當時雖由於財政困難，未克實現；然此一構想，迄今仍是極為切合實際的構想^⑭。

此文的發表，已時隔五十四年，早逾半個世紀。而羅先生的意見，依然異常新鮮有力，絲毫不失時效，為治近代史者奉為圭臬。他抱「功成不必自我」的態度，認為準備好基礎的材料，勿須一定要自己來寫成全著，冀望於「後來之筆」，這完全是拓荒者的精神！他個人的「專著」不多，然倡導之功則永為後輩所懷念。

羅先生晚年在臺主持黨史會，前後逾十八年，四十七年四月起，又任國史館館長，亦達十一年之久。任內主編「國父全書」、「革命文獻」、「中華民國史料叢編」，增訂「國父全集」、「國父批牘墨蹟」、「開國名人墨蹟」、「黃克強先生全集」、「吳稚暉先生全集」等多種，凡此皆為他半世紀前理論的實踐。國史館和黨史會的前輩和朋友，類皆能道其詳，勿須贅述。在他的手中，又完成了「國父年譜」初稿和二稿，虛心接受批評，繼續補充修訂，務期臻於完善翔實^⑮。他在初稿「導言」中稱：

「國父領導國民革命，波瀾壯闊，其生命動態常為時代演變之重心。故有若干事實，並非直接屬於其本人，但為其流風所被者；且有若干相反之事實，因之而引起國父之決策與行動者；設不予以提及，則讀者將無以明瞭某一時期歷史現象之因果。如認為此係通常年譜中所不經見，蓋由於此一主持國家民族命運者本人之生命，常與當時歷史相互交織而成也。」

由此可窺其對編寫之體例、綱目之安排、史料之考訂和引用，皆係經過縝密的考慮，這的確是他晚年「花費心血最多的一件工作」。

羅先生固然具有科學史學家的精神，這不過是他的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他也具有哲學史學家的精神，此點可能為人所忽略。在其「歷史的先見」一文中，指出在現代歷史演進程序劇變的時代，「歷史先見」(Historical foresight) 很關重要。處理事情，應當根據歷史教訓；如果不明瞭歷史的教訓，歷史就會很慘痛的重演一遍。歷史原則雖與科學定律不同，無法用客觀的方法來實驗和證明，但歷史事實有其本身的真實性，有其相互的關係，有其演化的趨勢（此點與柯林吾 R.G. Collingwood 的學說，頗相近似）。科學的歷史，就是在千頭萬緒的歷史事實中，抓住它們相互間主要的關係，再從時間的系統中，尋出它不斷演變的趨勢，則融會貫通，自能發現一種原則，以指導民族乃至人類的命運。歷史的先見，就是以這種歷史的原則為根據的。歷史的先見要靠哲學的修養，歷史家要有對社會的認識和對人性的了解。不只要作埋頭的研究，還要能作凌空의 觀察。不只要做專家，也要做運才。也就是說，在專家的知識之上，還要有一種哲學的了解，以領會到全部人事變遷的跡象。「不但要認識樹，而且要認識森林。不但要認識近況，而且還要認識遠景。遇事必須不懷成見，心無所蔽的去觀察，才能够從繁複的事實之中，透視出光榮的歷史全景。歷史的先見，不是預言，而是更進一步的認識，更深一層的判斷。它的正確與否，常能左右人類的命運，或整個歷史的命運」^⑯。我們不但要保存歷史，而且要創造歷史，則對歷史先見之尋求，極為重要。這是羅先生的真知灼見。

此外，擬簡述羅先生與郭廷以教授的關係。

郭教授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，受羅先生的鼓勵甚多，啓發極大。羅之才華橫溢，方面極廣；郭則篤實沉潛，以畢生之力專注於近代史之研究。日後二人過從極密，誼在師友之間。郭爲東南大學畢業，民國十五年夏，羅先生返國時，始從之遊。十七年三月，北伐軍總司令部設立「戰地政務委員會」，羅任委員兼教育處主任，隨軍北伐，擔任前線政治工作。郭即在「教育處」任職，官階爲上尉。此爲二人共事之始。十七年八月，國府任命羅氏爲清華大學校長，九月就職，郭隨往清華任「教員」；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五日，羅氏接長中央大學，郭又隨往任歷史系講師，開「中國近代史」、「中國現代史」、「明清史」等課程。抗戰時期，中大內遷，校本部設於重慶沙坪壩。郭住在石門村（中大教職員宿舍）一號，羅住於小龍坎半山上的半畝園，附近有橘樹林，風景優美，兩家寓所僅一條公路之隔，故過從更密^⑮。

民國十五年秋，郭受羅先生的指示，開始纂輯「太平天國大事日誌」，備作治近代中國史者的工具。此一大事日誌，有八種附錄，其中之一即爲「天曆與陰陽曆對照及日曜表」，考訂文章則係對此表的說明，原題爲「太平天曆與陰陽曆對照訂正」。羅先生認爲表與文不妨單獨印行，成一小冊，並爲之改名爲「太平天國曆法考訂」。初稿作於民國十九年夏，其後續有增改。二十六年一月，「太平天國曆法考訂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爲第四次的修正稿，亦爲郭的第一本專書。「太平天國大事日誌」，後改名「史事日誌」。

於二十九年亦由商務出版，由羅先生寫了一篇短序，略論太平天國的歷史，由於文獻的毀滅與禁忌，遂成爲恐怖的象徵，或神秘的淵藪，充滿了「神秘的」與「浪漫的」色彩。而從客觀的史實，以嚴整的史學方法，來研究這一代成敗興亡的人很少。他讚美這部書是意外的收穫。並稱：

「要寫太平天國史，必先把太平天國的史實，用比較的方法，考訂其準確性；再按其時間的順序，列舉下來；以時間來統帥錯綜複雜的事實，俾便發現其因果或前置 (Antecedent) 與後隨 (Consequence) 的關係，然後始可著筆。」

這是羅先生研究近代史的原則，也是郭所實踐的方法。羅本來答應爲郭的這部書寫一「長篇導言」，把他對於太平天國一代興亡的觀察，詳細的寫出來，這將是綜合的、鳥瞰的、綜觀會通的工作，可惜處於「火光彈聲」之中，竟不能着手^⑯。郭亦在本書「凡例」第二〇條中特別說明：「本書之作，羅志希先生實予以極大之指導與助力。即『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』一名，亦爲羅先生所擬定。」

郭教授的鉅著「中國近代史」第二冊，係民國二十八年完成，而以羅先生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」一文增訂稿爲「引論」。初版於民國三十年由商務印行，其「例言」是二十八年五月五日撰寫的^⑰。其第一條稱：

「歷史研究，應自史料入手。以近代中國史論，現在尙爲史料整理編訂時期，而非史書寫著時期。羅志希先生已詳論之（見本書「引論」）。」

第十二條稱：

「編者專力於近代中國歷史，則實受羅志希先生之教誨；本書之編輯，所得羅先生之指導協助尤多。」

由此可見，郭教授在近代史方面的成就，都是羅先生一手促成的。

民國四十四年二月，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，聘郭教授爲籌備主任，此時羅先生正主持黨史會，對郭極力鼓勵。二人寓所相隔不遠，時常過從^⑱，並期待兩機構間之密切合作。他們在數十年前對研究中國近代史所抱持的理想，眼看着將可實現。近史所自籌備以迄正式設所，其間整整十年，其規劃和設計，仍着重於整理和編輯史料，以及從編「引得」(Index)着手。其後一序列「史料彙編」的出版，仍是遵循着羅先生所提出的「編訂中國近代史料叢書」之原則。近史所復從事「口述歷史」及「專題研究」兩項重要工作，亦不出羅先生所指示之範疇，此一範疇，仍不失爲治近代史之正確途徑。羅先生爲近代史研究的倡導者和開風氣者，他以「點金之指」，指出幾點科學的研究方法，已可使後輩受用無窮，說他爲前驅的學者，誠非過譽。

三、新文學的闖場

文學往往由於時代的變遷、環境之各殊、思潮之差異，形成不同的風格和內涵，以及不同的表現方式，本難截然劃分新舊。羅先生爲新文學運動初期的健將，以文學理論和翻譯見長，所譯

「近代英文獨幕劇選」，尤膾炙人口。他甚少從事文學創作，惟酷愛寫詩，其早年新詩散見於新青年雜誌及新潮雜誌^②。同時為詩者尚有俞平伯、康白情、朱自清、傅斯年諸人，多不脫舊詩詞之痕跡，仍在嘗試階段^③。嚴格說來，他所寫的新詩，儘可稱為「詩歌」，並非純粹的詩，因為詩與歌是不同的。他的新詩中「歌」的成分較多，而且日後他的確寫出多首極為出色的歌，像「新疆歌」、「大漠情歌」、「青海歌」^④、「玉門出塞歌」等，都是音韻鏗鏘，熱情奔放，後二首都譜成曲子，傳誦一時。羅先生的國學基礎很深，所寫新詩殊難擺脫格律之束縛，其最成功的代表作却應該算是舊詩「心影遊蹤集」上下兩卷。例如「山橋夜立」一首云：

「雲散月凌空，疎星落澗中；

半山秋雨過，永響亂松風。」

飄逸遠緻，直追王摩詰、孟浩然之神韻，所以羅先生本身即兼新舊文學之長。從表面上看，新文學的特徵有二：一為白話文學；二為受西洋文學影響的中國文學。就前者來說，是專指「文體」而言；就後者來說，則涉及到風格、內涵等之變化。如以詩為例，像謝冰心、宗白華受泰戈爾的影響，戴望舒、李金髮受法國象徵派詩的影響，徐志摩受雪萊、拜倫的影響，臧克家受普希金的影響等。以上的看法，只是皮相之論，未能深入。而羅先生所闡揚的「新文學」，是另有一層意義的。

一般認為五四運動與「新文學運動」，是一而一的，事實上並非同一件事。從時間上看，新

文化運動的發端，應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，新文學運動又比新文化運動要早了一年多；換言之，新文學運動的高潮，是在民國六年的前半年。從性質上看，五四運動為一個純粹的愛國運動，有濃厚的政治性；新文學運動亦即「國語文學運動」，乃是一種有意識的文學解放運動，以現代人的語言文字，來表現現代人的思想情感。進一步把「國語的文學」形成「文學的國語」，使全民的思想意識，都能自由的交流，用以鞏固中華民族的團結。英、德、義各國能形成現代的國家，都經過這種文學革命的過程。此種觀點成為倡導新文學運動諸人的理論基礎，胡適的「文學改良芻議」^⑤，便是由此產生的。羅先生對新文學的闡揚，亦即從這個理論作為出發點，將其精神加以透徹的發揮。當羅先生在北大讀書的時代，就與傅斯年等在民國七年十月至十二月，籌備「新潮」雜誌的創刊，其創刊號出版於民國八年元旦，比「五四」還早四個月又三天。

「新潮」的中文名稱，係羅先生所定；英文名稱 The Renaissance，則是徐彥之所主張。這兩個名詞，意義相通，且可互譯，並代表着他們的三項中心思想，即批評的精神、科學的主義和革新的文詞。八年秋，傅斯年赴英留學，羅獨負編輯重任，迄九年秋赴美為止。從新潮一卷至三卷，他共寫文章三十六篇，佔着極重的分量，內分論著、評論（包括書評）、詩歌、通訊四類。其中談及新文學者，有「今日中國之小說界」、「什麼是文學」、「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」、「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」等四篇

，其對新文學理論的引伸、辯護和肯定，俱包括於其中。

當時新文學運動曾受到猛烈的抨擊，羅先生劍及履及，起而防禦，於八年四月九日撰成「駁胡先驥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——解答幾種對於白話文學的疑難」一篇長文，在「新潮」一卷五號發表^⑥。文中首先討論文學與文字之區別。胡先驥謂：「文學自文學，文字自文字。文字僅取達意，文學則必於達意而外，有結構，有照應，有點綴，而字句之間，有修飾，有鍛鍊，……非謂信筆所之，信口所說，便足稱文學」^⑦。羅先生關以「結構」、「照應」、「點綴」、「藻飾」等都是文學上的枝葉；因為文學係為人生的表現和批評而有的，除了「藝術」之外，還要有「最好的思想」、「感情」、「想像」、「體性」(Style)及「普遍」等特質，白話文學最能表現這些長處。復又討論「言文合一」問題。胡先驥認為言文合一為謬說，蓋歐西戲曲，雖取通俗，小說雖採白話，而所用典雅之字仍夥；其歷史家、科學家等「莫不用極雅馴生動之筆，以紀載一代之歷史，或敘述辨論其學理，而令百世之下，猶以其文為規範……夫口語所用之字句，多寫實；文學所用之字句，多抽象」^⑧。故用白話來說說高深的理想、抽象的觀念，是難以割切簡明的。羅先生拿胡適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」來駁他，說明胡適的主張是「國語的文學、文學的國語」十個字，其意為「文學是要用國語來做的，纔會成真文學；國語有了文學的性質以後，纔是真正國語」。真正的文學一定要用當時的語言做、現代

的語言做，文學隨語言而變更，語言亦隨文學而進化。他對新文學的看法，可說是一針見血之論，這種意見，一直到羅先生的晚年，並沒有多大的變更。

羅先生對新詩的見解，也是從同一理論來引伸的。他認為就詩的體(Substance)，用(Form)和特質來看，白話自然可以為詩。新詩的特色有五：一、重精神而不重形式，二、用當代的語言，三、絕對的簡單明瞭，四、絕對的誠實(即所謂 Poetic Truth, 真)，五、音節出乎「天籟」。羅先生日後所寫的舊體詩，的確具有上述之優點，故能音韻天成，卷舒自然。惟詩之特色甚多，諸如暗示、象徵、音色之交錯、形象之創造等，皆須講求；形式之藝術，亦推陳出新，斷非「簡單明瞭」所能包括。羅先生壯年從政，于役南北，無暇及此，故其新詩始終難以突破初期的風格。

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年之間，羅先生出使印度，與著名女詩人奈都夫人(Mrs. Sarojini Naidu)，頗有過從。奈都莎綠琴尼為印度革命元老，印度獨立後，出任聯合省省督，駐於省會樂克勞(Lucknow)，羅氏曾誌與締交之經過云：

「奈都夫人為著名女詩人，英國文學修養甚深。早年即從事革命運動，與甘地及尼赫魯之父為同輩，故對尼赫魯以子侄行視之。印人尊為革命祖母。時年七十，猶談笑風生。……余使印以來，常與往還。從文學、藝術、宗教、社會，乃至其內部之政治問題，均縱談無所隱飾

。余因屢承其邀約，後由潘尼迦(Gardar K. M. Panikkar) 慫恿，遂相偕作此女詩人督署之上客者數日，招待備至，出自真忱」²⁹。

從此她成了羅先生親密的文字之交，並擔任印度的中印學會會長，對兩國文化交流，極為盡力。三十七年九月，我國駐印大使館秘書蔣文開將她的詩集「御笛集」(Scattered Flute) 譯成中文出版，羅先生特以「題御笛集」新詩一首，加以品題，列於卷首：

印度偉大女詩人奈都夫人御笛集，是她革命時代心絃震蕩的聲音。也是印度靈魂的歌唱。茲經蔣文開先生譯成中文，為寫一首新詩，在這詩的前頁。

「原來是美麗的英文，珍珠似的圓潤；但是寫出來的，却是沉鬱的印度心靈。

她有亡國的悲痛，她有復國的精神；她有女性的溫存，她有革命的熱情；

她顫動的珠淚，滴進了未死的人心，她砍下希馬拉雅山的龍竹，把這枝御笛做成，在印度洋邊和着潮音，吹出自由的新聲。」

羅先生的這首詩是在新德里寫的，此時他已五十二歲。他盛讚奈都夫人的詩是印度人心靈的迴響，也勾起他早年提倡新文學的雄心壯志。奈都夫人於民國三十八年(一九四九年)三月二日凌晨突然逝世，享年七十歲³⁰。羅先生聞耗，即日下午二時飛往樂克勞送喪，並以中國駐印大使的身份致誄詞云：「詩人政治家莎綠琴尼奈都的突然逝世，使我心悲。這樣重大的損失，不僅是印度不可挽回的損失。在印度，她常被稱且將永遠被稱為印度獨立之祖母，在整個世界她是人類史上的偉大女領袖。她的和善的心地、磁性的人格、安慰的精神、迅速的機智、不竭的靈感，在政治、詩歌或其他方面，她對於人類繼續是一座智慧與幸福的山」³¹。

此一誄詞本身即是一首優美的詩篇，羅先生在對中國新文學的耕耘中，所獻的心力，又何嘗有遜於奈都夫人對印度詩壇的貢獻呢！他晚年在臺期間，很少再寫有關新文學的文章，僅於四十八年七月，應邀赴西德法蘭克福，出席國際筆會，以「科學時代的想像文學」為題，宣讀論文，獲得熱烈的回響。他對文學的認識，更深更遠了。

註釋

①羅先生「手書自傳」，見「羅家倫先生文存」。

②見「羅志希先生行述」蔣永敬：「羅家倫先生」，中國歷史學會「會訊」第十期。呂芳上、夏文俊編「羅家倫先生大事年系」。

③見「手書自傳」。

④羅先生「心影遊蹤集」自序：「掠取落英

續紛之物感，使融洽於稍縱即逝之心靈。」可見其素志。

⑤ 蔣永敬：「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」。

⑥ 羅先生「壇坫風濤憑弔蔣廷黻先生」。

⑦ 羅先生序郭廷以著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」。

⑧ 羅先生序郭廷以著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」。

⑨ 見拙作「英國珍藏的漢學資料」。按威妥瑪(Thomas Francis Wade)藏書中有關太平天國的原件甚多，如東王、西王、干王、英王等的布告，清軍江南、江北大營的探報等。

⑩ 按此文最初發表於武大「社會科學季刊」二卷一號。

⑪⑫⑬⑭ 羅先生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」。

⑮ 蔣永敬「羅家倫先生的生平及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貢獻」。

⑯ 羅著「文化教育與青年」。

⑰⑱ 郭廷以教授親自談及。

⑲ 按羅序寫於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是年從五月至十月，日機長期空襲重慶，中央大學在六、七月間被轟炸三次。

⑳ 按本書例言寫成於二十八年五月五日，適為渝市「五三」、「五四」遭日機大轟炸之後。

㉑ 羅先生寓臺北潮州街，郭則住和平東路。

㉒ 羅先生在「新潮」雜誌發表的新詩，有「雪」、「除夕入香山」、「天安門前的冬夜」、「往東車站送楚僧赴法」。

㉓ 見拙作「民初文學的趨勢——1912-1927全集」。(下期續完)

㉔ 見「心影遊蹤集」。

㉕ 見「新青年雜誌」。

㉖ 此文收入「羅家倫先生文存」。

㉗ 見胡先驕「中國文學改良論」。

㉘ 「心影遊蹤集」下冊，「天竺紀遊集」，「薄暮漫步樂冠勞(Lucknow)督署花園」詩並序。詩云：「新涼初上女兒紗，路暗迷人百種花。翠樹疊屏芳草褥，笑牽錦幕陟天霞」。

㉙ 奈都夫人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，甫過了七十壽辰，未及兩週，即告逝世，也可算是七十歲。

㉚ 陳文開「女詩人之死」，見「奈都夫人詩全集」。

蘇大師蘇曼殊的特殊篇章。戚宜君的「蘇曼殊外傳」寫到大師之飲，篇名是：「千金買醉無吝色」，其中「共枕不亂」、「文學因緣」、「梵文學堂」、「花朝落日」諸章都是罕於一閱的文壇秘笈、珍聞軼事，可以入史，也可以據而為文。值得一讀再讀。

編輯報告(一) 編者

△從助理研究員到三任十年縣長，兩年行政督察專員的董中生教授說：「朋友以爲我一輩子從未從事過幕僚工作。」但是董中生教授說他做過，而且還做過各種各樣的幕僚工作。因此，他爲中外雜誌寫了一篇「政海生涯五十年」，對於公務員生涯的甜酸苦辣，半個世紀間的官場見聞，作生動而又真實的白描。五十年辛勤歲月，化爲不及一萬字的好文章，當然是字字珠璣，極有價值。

△李昌來教授的「湖南大學六年回顧」，越寫越精彩了，因爲他峯迴路轉，筆調一致，開始寫他多采多姿、妙趣橫生的大學生生活，從良師益友，功課，捉賊，到撮合姻緣，壯起膽量邀約女生，等於是他自己自傳中最絢爛的一章。

△心絞痛有一個讀來琅琅上口的英文學名叫Angina，它却是戕害人類的無形劊子手，鑒於國內外心絞痛患者越來越多，且已成爲中老年人習見的一種疾病。本誌承蒙張振玉教授交來「心

絞痛開刀記」。名家執筆，寫他自己治療宿疾的親身經歷，予醫生、病家、家屬在生動流暢、可讀性高的傑作之中，獲得直接、有效的智識以及經驗，一向是中外雜誌最大特色之一。這一類的好文章極其難求，得來不易，幸請讀者惠予密切注意。

△中外雜誌這一期有兩篇描繪革命和尚、文

吟哦玩味，值得細讀。

南京城陷因避敵氣而曾削髮爲僧的鈕先銘將軍，一向是位風雲人物。他的若干際遇，曾在勝利後拍攝「大江東去」等多部影片，轟動一時且流傳久遠。鈕將軍這一次特別爲中外雜誌撰寫「蘇曼殊、張大千、小僧我」，將我國近代三位聞人的生平妙事，隨手拈來，信手揮灑即成佳構，值得

吟哦玩味，值得細讀。